◆纵　横

把“背景”逐出社会运行逻辑

“背景”是一个说法、一种现象，有背景意味着能办事、办成事，而没有背景则似乎意味着办事难，甚至此路不通。

这当然是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其要害是对法律、制度的消解，让有背景者享受超级特权。有背景，可以占有稀缺资源；有背景，使游戏规则形同虚设，还可以让禁止性规定给个别人大开方便之门。看似仅仅做生意、发横财，顶多让他人妒忌，但正如瑞海公司暴露出来的，破坏了市场、法治规则，真正的危害是巨大的，绝不是发财这么简单。概括地讲，背景破坏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奇怪的是，我们社会似乎对“背景”横行见怪不怪，除了无奈，其实还有几分欣羡。一说某企业“有背景”，很多人表示恍然大悟，仿佛一切问题都可以解释通了。市场、法治，这些代表社会进步的制度文明，到底如何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的呢？以“背景、关系”解释社会运转的逻辑，这是一些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不罕见，也极其不正常。“有背景”，破坏了游戏规则，很多人却从不愤怒，通常可能只怪自己背景不深。仗着背景，公开炫耀者有之，被刮目相看者有之，还有领导干部主动趋奉有背景者。背景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适用的通行证，威力强大。

背景横行不是没有后果，瑞海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反面教材，更是一个隐喻。瑞海公司有背景，使各监管环节被架空，最后一炸惊世。背景呈现的并不仅仅是攀附权力，更意味着权力失范，不仅一些身居要职的人滥用权力，而且权力还被其他人盗用和借用。权钱交易、垄断资源，也架空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邪恶和不义在规则边缘疯狂生长，极端的情况，便是带来血的代价。普通人的平静与无奈只是一时表象，内心其实积累了巨大的不满。背景是社会毒瘤，也是定时炸弹。

背景扭曲了我们社会的观念和习惯，这种观念必须矫治，而一切的前提，是真正让人们能够从内心确信规则运行畅通，没有灰色地带，按规矩做事才能获益。总之，要彻底把背景驱除于社会运行的逻辑中，让公平、公正、公开的力量彰显。（2015年8月20日《长江日报》杨于泽）

公开危化品分布图应成为制度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补牢总胜过任羊圈洞开。但是，这话的潜在逻辑是，等到羊丢了才补牢。其实，事后补救永远不如事前防范。天津港爆炸事故，损失惨重，吃一堑长一智不仅针对天津港，其他地方虽未吃堑，仍有长智之必要。

长智的范畴宽泛，摸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有多少家，主要分布何地是第一步。如果家底不清，就谈不上监管。摸清家底，登记在册，才便于监督，但监督不是象征性地走形式，而要实打实。

摸清家底并公布家底，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也方便了公众监督。同时，对危化品企业也是一种倒逼，众目睽睽之下，企业若有不轨行为，或难逃公众的眼睛，这就督促企业更有敬畏感。

国务院安委会于14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专项整治。排查对象不仅包括危化品，还包括易燃易爆品，不仅包括生产、经营企业，还包括运输、仓储企业。国务院还要求，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源头治理。

每一次安全事故之后，类似排查总是风生水起。但从时隔不久便重演悲剧可知，不少地方是“认认真真走过场，煞有介事搞排查”。排而不查，甚至不排不查，导致隐患仍在，从火星到火花，终酿惊人事故。

公布危化品分布区域，应成制度自觉。所谓的举一反三，不能只是漂亮口号；所谓的触类旁通，不能流于宣扬。天津港爆炸事故，让更多的人相信命运共同体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都在同一趟奔驰的列车上，如果发生倾覆，包括司机、乘务员和乘客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危化品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每个人都不能置之度外，须时刻保持戒备之心，否则危化品事故就会冷不防地偷袭一下。（2015年8月21日《京华时报》王石川）

◆观　点

体制的可改革性比改革重要

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的改革演变而来，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因为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的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增长和发展的进程会导致既有体制的某些方面不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正在成为增长的桎梏。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的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让我们的体制去适应不同的和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重要的。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为了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的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日本、拉美都是如此，印度也是如此。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要理解这一点，看看今天的印度就够了。过去这些年来，辛格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最低工资法”的制约），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相对照东亚的体制，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是，在印度的体制下，改革谈何容易。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但经济学家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游说势力过于强大，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2015年8月24日《北京日报》张军）

新领导力：硬权力加软权力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从经济新常态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对领导者而言，一方面要严以用权、依法用权，同时要面对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对传统领导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笔者认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需要新领导力。领导者不仅是适应，更应该主动求变，构建新领导力，包括新的领导理念、新的领导方式、新的领导方法。因此，领导力同样也需要着全方位的变革。

那么，传统领导力在当今变革时代面临哪些挑战？笔者将新领导力形象地用公式表达为：新领导力＝硬权力+软权力。

在这个公式中，硬权力是一个“常量”，不管领导者的能力大小，只要居于同一职位就几乎具有相同的硬权力。硬权力是外在的、有限的、强制性的，硬权力带来的只能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硬权力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硬权力也不行，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时期，没有硬权力，一切改革都难以推动，一切改革成果也都无法保障。

而软权力是内在的、个人的、无限的，它是一个“变量”，软权力带来的是下属和群众对上级领导发自内心的认同。软权力源于领导干部的品德高尚、作风过硬、能力超群、经验丰富和绩效超优等与个人相关的多种因素。

领导者在某一方面有鲜明的个性突出的优势，于是就产生了个性的软权力；领导者廉洁奉公、品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于是就产生了品德的软权力；领导者业务能力强、知识面广，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是本部门的行家里手，于是就产生了专长的软权力；领导水平高善于用人，在沟通协调和激励凝聚方面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就产生了领导艺术和管理专长的软权力。

领导者的软权力是多方面的，这些方面的影响力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叠加起来产生影响。而软权力一旦叠加起来，就可以产生“1+1>2”的效果。

领导者要善于发现和利用自身的软权力资源。关键是领导者要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中的几个软权力，然后把它们叠加起来以增强软权力的效果。

新领导力公式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则在于要软权力和硬权力结合起来使用，以增强整体影响力。

如果只依靠硬权力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领导者处处靠威严，靠职权，下属可以不听你的。反过来，只是运用软权力也很难达到目的。只有搭配使用才能放大领导绩效，针对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对象，这两种影响力的比例可以有所不同。

特别是当下，领导者硬权力的作用在逐步减弱，软权力的作用在逐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建议，领导者要尽量先用软权力，后用硬权力；少用硬权力，多用软权力。

当一件事情既可以用硬权力解决，又能用软权力解决时，就应当尽量用软权力解决。这样一来，领导者的软权力就会越来越强，即使硬权力减弱，总的领导力才会越来越强。（2015年第7期《决策》刘峰 吴明华）

◆评　论

放纵逆动就可能重蹈覆辙

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画上句号。这是全世界铭记的日子，日本必须郑重对待这一天所标志的意义。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以显而易见的两面性措辞，完成了预设程序。“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能够标志痛彻对待历史的关键词，弥散于遮遮掩掩的语境中。本应有的诚意以折扣的形式面世，引起日本国内外人士的诸多诘问。

如果说，这个谈话姑且可以算作日本政府代表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向世界作出某种交代的话，那么日本在今年这个“8·15”纪念日里呈现的现象又该作何解释？

15日的东京，依然如故地上演政治闹剧——日本一直存在的那股试图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力量，毫无忌惮地暴露着丑陋面目。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代表安倍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表示“对于英灵的感激之情，对于靖国的心情不变”。3名日本内阁阁僚以及70多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

参拜靖国神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靖国神社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它不是哀悼战死者的设施，而是褒奖那些为军国主义而死者的设施。”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对靖国神社性质的概括一针见血。如何对待靖国神社问题，实质上是对昔日侵略战争性质的认知问题。

那些日本政治人物究竟是聋了，还是瞎了？2015年，多么不同寻常的70周年，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不同形式纪念这场改变人类命运的胜利。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总统高克来到曾用于关押苏联红军的“森讷第326号战俘营”，公开对二战中苏军遭受德军迫害进行谢罪，为德国反思战争罪行又扫除了冷战留下的一个盲区。在联合国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特别大会上，德国代表诚恳地告诉世界：“在联合国大会厅里，我们德国人今天谦卑地低下头，缅怀数以百万计的二战受害者。德国已经承认对二战罪行负有责任。这份责任我们会永远承担。至今，我们仍为我们所受到的宽恕感到惭愧和感激。”立此存照，过往的罪孽不容淡忘，念之、斥之、警之、戒之，十分的诚意与切实的行动，缺一不可。

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促使人们意识到，作为当年负有侵略战争罪责的国家，今天的日本还在政治层面同国际公理正义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投降日拜鬼体现了错误的历史观和对人类公理正义的挑战，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推动安保法案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防的潜在祸始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国外强大的反对声音，肆意推动新安保法案。这是战后日本前所未有的举动，可能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是否要改变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否会在挑战战后和平国际秩序、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日本呈现的逆和平潮流而动的现象，都是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体现。放纵这些逆动，就极可能引来邪恶势力的反扑，导致重走战争之路风险的上升。在这一点上，日本的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存在广泛共识，日本在摆脱战后体制方面的现实举动更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警惕。

历史的教训必须时刻牢记，对正义的捍卫丝毫不能放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人们需要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认真思考：坚守什么、摒弃什么、警惕什么、杜绝什么。（2015年8月16日《人民日报》钟声）

◆史海钩沉

二战清源：正视中华民族的贡献

现在西方史学界一谈起二战，脑中浮现的就是苏德战场的惨烈、诺曼底登陆的激烈、太平洋战场的悲烈，而鲜谈中国战场的壮烈。即便谈起中国战场，又强调“置日本法西斯于死命”的美国那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远东的意义，而鲜谈中国军队14年抗战的决定性意义。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到底如何？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身为中国人，我们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贡献，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功不可没

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陆军的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北进”计划，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致命危险。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抽调54万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大大加强了西线对德作战力量。斯大林曾谈道：“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中国抗战还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有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派往太平洋战场的仅10个师团。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可以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中国成为抗击法西斯在亚洲大陆侵略的主要战场，中国抗战直接决定着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成败。

中国军民对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贡献功不可没

首先，中国对日作战时间最长。从九一八事变起到日本投降共14年，其中局部抗战6年，全面抗战8年。到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只身抗战八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赞“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德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指出：“中国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国地域广阔，军队众多，作战坚韧，富于人民战争精神，士兵熟悉环境，使中日战争的景象与日本对西方列强进行的陆战迥然不同。”美国对日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时间不到4年；苏联从1945年对日宣战到日本投降，时间不到1个月。

其次，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有统计显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1938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94%，1940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7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64%和54%。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共有34个师团，其中的32个在中国作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深陷中国战场。战争结束时，在华日本陆军约105万人，太平洋战场只有83万余人。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人数达128.3万（不含关东军），是日本海外各战场中投降人数最多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自身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比值折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而苏军在远东战役中伤亡3.2万余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伤亡32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中国的持久抗战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战区发挥了东方主战场的作用。

国共两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功不可没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容置疑。一是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力量凝聚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二是提出并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方略问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三是树立了民主的旗帜，在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延安风清气正、充满活力，成为抗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海外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四是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承担了最困难的战略任务。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长达5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在他们从1934年到1947年作为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造中国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抗战将士都是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应该得到全民族的尊重。作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为抗战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确定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在长期抗战进程中，中国军队客观形成了正面战场的内线持久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外线速决进攻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特殊战争景观，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亡我中华的战略企图。

现在有些人拿国共两党牺牲的将领多少来说事，其实这里有许多不可比性。第一，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的战略资源，具有执政优势；第二，当时国民党军队有180个师的编制，而出于“限共”的考虑，只给了共产党三个师和一个新四军的编制；第三，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阵亡将领是牺牲后追封的，而共产党军队的大部分军官并未受衔。若以共产党团以上干部相当于国民党旅级将军来算，共产党军队牺牲的将领将高于国民党军。有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对日最后决战，中华民族至少有414位将领捐躯，其中共产党武装206位，国民党军189位，民众武装19位。在189位殉国的国民党将领中，时为国民革命军军长、上将或被追晋上将者有12位，共产党军队中正军职以上干部（包括东北抗联）牺牲者18位。在抗战中，首位殉国者为十九路军少将滕久岳，最后一位殉国者为八路军冀南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庆幸国共两党选择了共御外侮的正确道路，此乃中华民族之幸！抗日战争不应该是哪一党哪一派的胜利，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此，全世界中华儿女应联起手来，捍卫先辈们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果实，牢记历史，共御外侮，抵御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公理正义。（2015年8月21日《光明日报》罗援）